

# 明盛于斯生平及其《休庵影语·西游记误》考辨<sup>\*</sup>

## ——兼论《西游记》的早期传播

温庆新

**摘 要:** 盛于斯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其一生疾病缠身,多闭门不出,晚景遣怀途径主要有吟诗弄花、沉迷佛学及著书自娱,信息来源多为友朋信函,所读之书多为友朋所贻。《休庵影语》为其晚景之作,后为周亮工整理。其中《西游记误》亦追忆旧闻而成,撰写之时已无法核对相关资料;又因其笃信佛教以致对不合佛教教义的任何人事皆持批判姿态,故主观以为章回小说《西游记》九九之数为其原作所有。今存《西游记》版本实物及文献记载,亦可佐证《西游记》九十九回本说并不可信。学界据《休庵影语》推论《西游记》的早期版刻系统,多有臆断。对《西游记》早期传播的讨论应建立在能通过求证或证伪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非以未经论证的假设为讨论前提。

**关键词:** 盛于斯 《休庵影语》;《西游记》;周亮工;早期传播

DOI: 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5.003

作为章回小说《西游记》早期传播的重要史料,明人盛于斯《休庵影语》之《西游记误》因提到《西游记》若干版本及《总批水浒传》指出叶文通假名李贽评点《水浒传》等信息,向为治小说史者所重视。但学界至今尚未对盛于斯及《休庵影语》进行过深入探讨,不仅盛氏生平多有阙轶,亦影响对《西游记误》有关章回小说《西游记》早期传播之版刻信息的解读。同时,在今存《西游记》早期传播的资料记载、版刻信息等文献的基础上,若能建立一个通过求证或证伪的“科学研究”的讨论平台<sup>①</sup>,而非以未经论证的诸多“假设”或“可能”为讨论基础,这对全面梳理《西游记》的早期传播、成书时间与版刻系统等,或将有所帮助。

## 一、盛于斯生卒年辨及其他

盛于斯,字此公,又字铨侯,初名簪,南陵人(今属安徽省芜湖市)。有关盛氏生卒年:一说生卒年不详,此说多见于工具书中,如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10传奇二“明代作品(下)”录盛氏《鸣冤记》时言“但于其字号、里居、生平皆‘未详’。”<sup>②</sup>《中国词学大辞典》盛于斯条<sup>③</sup>、《中国曲学大辞典》

\* 收稿日期:2015—06—05

作者简介:温庆新,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沙410081)。

① [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83页。

②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87页。

③ 马兴荣等《中国词学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盛于斯条等<sup>①</sup>,皆言“生卒年不详”。一说卒于明崇祯六年(1633),如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前言》<sup>②</sup>;一说卒于明崇祯九年(1636),如《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盛于斯条<sup>③</sup>、《中国戏曲志(安徽卷)》附“皖籍戏曲作家、音乐家、演员简历表”盛于斯条<sup>④</sup>,皆作“1598—1636”;一说卒于崇祯十二年(1639),如吴圣昔《论〈西游记〉鲁本和周本信息的异同性》<sup>⑤</sup>;一说卒于崇祯十三年(1640),如陆勇强《明清曲家生平史料钩沉三则》<sup>⑥</sup>、孟晗《周亮工年谱》“崇祯十三年”条<sup>⑦</sup>,等等。上述文献言及具体卒年者,多据周亮工《盛此公传》以推论,分歧在于传中所言“会予成进士,官山左,不能即至秣陵”之信息的解读。

案,《休庵集》上卷《吊芙蓉赋》“小引”言“乙亥春,偶得一本。”<sup>⑧</sup>乙亥为崇祯八年(1635);又,下卷《渔家傲》“小引”言“余己未冬尝同一情痴围炉煮雪……今一俛仰间,遂十七年于兹。”己未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又,《休庵影语·与周元亮》言“丙子孟秋之书,寝阁金陵耶……读丙子贤书,犹不见元亮讳字。”<sup>⑨</sup>丙子为崇祯九年。玩其口吻,此信当作于崇祯九年以降。据此,则盛氏于崇祯九年仍健在。其实,《休庵影语》有《此公自作墓志》,言“癸酉二月,余病剧,尔时诸友悉赴宛陵就试,欲取身后一言,以作盖棺计,了不可得。从昏瞢中,自撰数语,聊以仰告后人耳。文,则吾不知也;盛于斯者,即此中骨。大业未就,恶病缠笃,苦不可支,饮恨而没。正命之年,三十有六,杉棺三寸,敛衣常服。”癸酉为崇祯六年,此年盛氏岁三十有六,则其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另,《休庵影语》载有其自撰《书亡女柔娘墓碑阴》一文,言“十五适董(文若),十七而死,死之日,盖己巳年八月初三也。”则万历四十年(1612)生女柔娘。至于盛氏卒年,据《盛此公传》所言,当在崇祯十四年(1641)初。案,周在浚《周元亮行述》言周氏崇祯十三年举进士;崇祯十四年入京谒选,得山东莱州府潍县令,同年秋日赴任<sup>⑩</sup>。故周氏所言“会予成进士,官山左,不能即至秣陵”,表明其听闻盛氏噩耗之时为其谒选山东潍县令之后,而非成进士之时,且周氏即将赴任前而不能前往吊唁。若上述不虚,则盛氏当卒于崇祯十四年。

盛氏一生疾病缠身,《休庵影语·可怜娘沈孺人墓碑阴》曾自叹“我不肖,罪孽深重,不见佑于皇天后土,身抱恶疾,年三十有三,而遂罹伯牛之厄,旧疾大作,龙钟委顿,不似人形。手足僵木,不便持行。凡一饮食,一栉沐,一结衣解带,一坐卧起立,以至涕唾便液汗秽不堪之事,无非我老母周全也。”又,《休庵影语·甲戌纪异》(崇祯七年)有言“余病发以来,不出休庵者已六年,只据我耳之所闻,身之所历。”《休庵影语·柬王邑侯》亦言“斯身轻命薄,病废时违,妄慕古人,闭户着迷,不窥篱落者,已四年矣。”知自崇祯二年(1629)起,盛氏行动已不便,多卧榻未出。而盛氏眼疾病发略早于身疾,约于天启四年(1624),《休庵集·告眼》小序言“余甲子四月廿八日,从江北回,坐目中忽生白翳,痛不可忍。”后至崇祯二年,目病更甚,梁一非《〈休庵遗集〉后序》言“自己巳冬,眚入双目,遂榻处休庵。”可证。《休庵影语》所载周亮工《盛此公传》又言“岁在辛未,予自大梁来秣陵省家大人,家大人好此公诗,语亮曰‘此间有盛此公,工为诗,儿识之。’亮因以父命往交此公。此公独异予,以为恨不十载前识。明年此公目病,数明晦,或不能视。”则盛氏双目失明或于1632年前后。这些疾病致盛氏晚景凄惨,友朋零落、精神困顿,尤使其著述来源多听闻他处或凭记忆追录,以致差误不少。

① 齐森华《中国曲学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0页。

② 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③ 邓绍基主编《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627页。

④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安徽卷)》北京:中国 ISBN 中心,1993年,第681页。

⑤ 吴圣昔《论〈西游记〉鲁本和周本信息的异同性》,《上海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⑥ 陆勇强《明清曲家生平史料钩沉三则》,《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⑦⑩ 孟晗《周亮工年谱》,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5、36页。

⑧ 盛于斯《休庵集》丛书集成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639页。下引《休庵集》皆据此版,除有必要,不再一一注明。

⑨ 盛于斯《休庵影语》,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第105页。下引《休庵影语》皆据此版,除有必要,不再一一注明。

## 二、盛于斯晚景情状及其遣怀途径

有关盛氏晚景情状,《休庵影语·柬甘太巖师》曾自我剖析“不肖迩来情状,不忍为师台言,亦不忍不为师台言。言之刃心刺骨,黯然消魂,无家而又无子,失明而又失声。兼之螟螣降殃,不遗秉穗,以七十仅存啄息之老母,对万死一生,无可奈何之病儿,亲戚灰寒,知交星散。时相过从者,止一区区东西南北之女夫。”简言之,属贫困交加、至交零落、家庭所累及内心迷茫、精神萎靡之类。尤其是,疾病缠身使得盛氏不愿连累亲友,多宿于休庵,未出远门。据《休庵影语·柬王邑侯》(作于崇祯二年)所言“斯身轻命薄,病废时违,妄慕古人,闭户着迷,不窥篱落者,已四年矣。”知其闭门谢客后的主要活动则是慕古著书。而其晚景信息来源多与友朋通讯,如《休庵影语·与周无所师》言“来谕云‘流贼獷狁,江动腹心’。尝考逆珰芟刈之后,往往有此变。”可知《与王后书》提到的“今流贼不逞”等信息系周无所提供。又,《休庵集·烛灯摇红》言“旧日曾相识,眼底红尘浪迹,待晴和生香扑鼻,临风一叹,说与而今个中消息。”而其间交游,多为盛氏去信友朋,希望友朋能到休庵一聚,如《休庵影语·与周元亮》言“近况作恶,身世事总不堪说,亦不尽说也。元亮梦寐间,见瞎眼头陀,蹒跚策杖而前者,此近日之盛此公也。惟元亮念之,图一相见。”或友朋因差事借道,如《休庵影语·柬甘太巖师》言“月小尽,梁一过休庵,见不肖伶仃委顿,略无人色。”等等。

盛氏晚景的悲惨遭遇,致其产生厌世心理。周亮工《赖古堂集》卷13《盛此公哭金冶王诗序》<sup>①</sup>曾说“冶王既没,此公众香,皆以英壮之年相继厌世。此公有稿,予既镌行众香诗文在安陵潜庵郑抚军所,当不淹没。”又说“予偶读盛此公哭冶王诗,因悲冶王负尤异之才,无以表见于世。后世之士,谁复知之。因此,以识于盛诗之前。又悲此公,念我亡友情,一往羁縻,方悲人琴俱没。余反复其诗,未尝不留连泣下也。”案:据周亮工之序:金鼎,字冶王,京口人(今江苏省镇江市),因喜佛“乃至不婚不宦”。“抗厉希古,不可一世”,年二十九以疾卒于京口。“与人交,即以为性命”,生平所交者仅为盛此公、周亮工等数人。金鼎为人处世之偏激抗厉处,多同于盛氏。如《盛此公传》云“癸酉,予自秣陵返大梁,闻此公以目久不愈,愈愤激,家益窘乏,无从得医药,于是遂长盲矣。”这使得盛氏相关人事之论多有愤激偏激处。

在这种情形下,盛氏晚景的遣怀方式相对简单,要言有三:

一是摆弄花草,吟咏性情。《休庵集》所载,吟咏花草、赏心悦性者占有很大比例。盛氏常于诗作中借花草口吻以自喻,将《楚辞》开创的“香草美人”自喻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如《休庵集·哀柳》言:“瘦影丝丝不耐春,年年孤馆对离津。生憎命似杨花播,化作梨云梦里身。”即借“瘦柳”自寓,以“年年孤馆”、“梦里身”慨怜自身遭遇。这类作品前大多有小序,可窥见盛氏对草木鸟兽的钟爱。如《休庵集·桃杏》“小序”言“啜余亭之前,先君植桃杏数株,间以春紫荆三本。每花时四望,若海日才升,朝霞初结。暨乙丑岁,纪予明师复助余筑小苏堤。种绛者,深红者,淡白者,凡十余树,花时益加馥郁矣。”等等。可见,盛氏深谙草木鸟兽之道,向所观察惟以契合心境为最。除自赏外,与友朋赏吟遂为其间的另一主题。此类诗作流传较多,如《休庵集·春时忆甲子岁此日会客》云“垂条已绽郁金黄,十里红亭官道长。曾是送郎从此去,征衣留得一痕香。”这不仅有效消解盛氏心中的急躁,对其撰写《泪史》等著述涉及草木鸟兽性状时,亦多有帮助。

二是沉迷佛学,以求自解。除上言《哭金冶王诗》外,《休庵集》、《休庵影语》亦言及其与彼时僧师的交游唱和。《休庵集》存有《书觉苑师册子》等,其中《送僧汎海礼大士》云“愿将尘土事,一问海潮音。”尤见盛氏借佛以自慰之意。盛氏对佛的虔诚,使其不惜剃发向佛以求自遣,《休庵影语·柬甘太巖师》云“不肖自去年已秃发为僧,日向如来前忏悔一切苦恼因缘,以求速速解脱。”盛氏的虔诚使其难容“假

<sup>①</sup> 周亮工《赖古堂集》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佛行他”等相关人事,《休庵集·书居石师渡江册子》就有这方面的冷讽,云“余生平喜佞佛,而不喜僧,盖以僧不解作佛事,徒聚坐废食,非真有佛性者也……今年浪游栖霞牛渚间,无日不与禅和子篝灯煮菹,而意气似不相属,忽乡僧居石来,征其意盖欲渡江化缘。夫子不喜僧,尤不喜化缘,然既爱佛,不得不并爱佛之似也。今天下爱佛者甚多,师渡江不忧无斋。若师真能作佛事,予又何惜不以此顶踵毛发作布施哉。”这种不容瑕疵之癖,使得盛氏对不合佛教教义的任何人事皆持批判姿态,并以符合佛教教义为交友评事论书的准则之一。《哭金冶王诗》对金鼎的推崇之举,即是明证。

三是读书为乐,著书自娱。因晚景穷困及失明闭门,致其以读书为乐、著书自娱。但其所读之书多为去信友朋索取而得。如《休庵影语·与李为霖》言“弟穷冬无以度日,渴想《夷坚志》,以寄牢骚。愿我为霖寄我一部。”可见其十分珍惜读书之机,希冀能于书中寻求精神的解脱。这与其迷于佛学的心境及诉求是一致的。《休庵影语·秋半自课》又言“世界渐凉,已堪着眼,当急取古今之快事、愤事、怪事、狂宕事,一铨次之,品题之。仍取古人韵语、俊语、媚语、剑气语、两来语,一静参之,或长歌之。益取古今孤臣、荡子、征夫、醉顛、博客、怨妇,为位以泣之奠之,毋浪度此岁月也。”即见其读书之勤。而梁一非《〈休庵遗集〉后序》对盛氏双目失明后读书多强迫友朋读说之举有详载,言“自己已冬,簪入双目,遂榻处休庵。每得一奇编,强往来友人覆读一二番,旋即记忆,久之著杂抄、历法、舆地志、鸳鸯谱、鬼缙绅、群书考索诸集。且犹能兴托临池,尝大书数十纸。”与有关外界消息来源于友朋信札一样,盛氏晚景的读书大多受友朋所赉,致其读书信息来源有限,非第一手资料;友朋若有读错者,或所“听”之书的版刻情形,盛氏是无法核查的。何况盛氏所记往往是其听闻之后的“旋即记忆”,其间是否存有偏差恐亦难以核查。

盛氏著书与读书一道,是其寻求心灵安慰的平衡支点。《休庵影语·与蒋行素》曾言“弟今年尚活在人间,尚能闭户著书,尚能延揽天下英雄,但不能多吃酒多吃饭耳。”据周亮工《盛此公传》载盛氏:“《毛诗名物考》三十卷、《休庵杂钞》十卷、《历法》二卷、《舆地考》十卷、《群书考索》十二卷。今所传者独《名物考》耳,他皆不传。予遣掾就其家钞遗书,盛母泣而言曰‘儿著书咸为人窃去,唯存诗若干卷。’”民国修《南陵县志》卷43《经籍志》亦录有若干盛氏所著的书目:《休庵集》2卷、《休庵影语》2卷、《泪史》、《宫词》、《毛诗名物考》30卷、《休庵杂钞》10卷、《历法》2卷、《舆地考》10卷、《群书考索》12卷,等等。由于盛氏晚景亲戚灰寒,知交星散,几无亲友替其整理著书,作品多数已失佚;且据盛母之言及《休庵影语·纪遗》书札,知其被窃著述亦不知凡几,刊刻者只是吉光片羽。但其作之多、著述之勤,亦可见一斑。在盛氏眼疾益甚时,曾作《告眼》言“遂盲。斯不敢爱。但愿迟我二十年,一读未见书,一会别后人,一穷奇幻山水。若即今便瞎,当凿出以热酒啖之。”(《休庵集》)知其嗜书之癖。读未见书、会别后人及穷奇幻山水正是其晚景遣怀的三种主要方式。

而《休庵影语·与周元亮》云“弟所著《泪史》,略有头绪,错翁客抄,即日脱稿。恨我元亮远隔千里,不能过休庵数月,读我近来孤愤语、道学语,以作一绝快首弁也。迩来自家诗文序赞之类,一味骂人,又恨我元亮不见撒泼语也。”则“孤愤语”是盛氏读书、著书的另一重要评价标准。尤其是,其对古今书籍或人事中合符“孤愤语”者皆持赞赏。《休庵影语·泪史》自序曾说“盲人双眼中,犹有如许血痕。”又说“请各具三斗血痕,读我千秋泪史”,即证。又如,盛氏推崇李贽及其《藏书》,主要是李贽《焚书·忠义水浒传序》曾说“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sup>①</sup>与其思想相契合,故撰写《泪史》的期望则以“补充秃翁(案指《藏书》)之不及”<sup>②</sup>为主。又,《休庵影语·总批水浒传》言“读之令人喜,令人怒,令人涕泗淋漓,复令人悲歌慷慨”,即见盛氏对《水浒传》的表达重心在于此书契合其生平经历,尤其是“令人涕泗淋漓,复令人悲歌慷慨”等语与其所撰《泪史》旨意是相通的。在盛氏看来,《水浒传》所写确已道出其内心的无限委屈,故

①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转引自朱一玄等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1页。

② 盛于斯《休庵影语》,第24—26页。

《总批水浒传》文末所言“其文纵横出没,莫敢逼视,当与《十空经》并垂不朽,若以世间小说目之,呜呼冤哉!”将其推崇至符合政教传统的地位,评价不可谓不高。案,《十空经》即《大无工十空经》,宋遗民郑思肖所作。据正德《姑苏志》卷55所载:郑思肖(1241—1318),字忆翁,号所南,连江人。素不取,好诗文,多寓于名山名刹,曾自题其像曰“不忠可诛,不孝可斩。可悬此头于洪洪荒荒之表,以为不忠不肖之榜样”。宋灭后,“适意缁黄”,自称“三外野人”。著《大无工十空经》1卷,自言“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为大宋经,造语奇涩如庾词”。自题其后云“呕三斗血,方能书此,后有巨眼识之”<sup>①</sup>。盛氏推崇《十空经》亦由于此书“呕三斗血,方能书此”之寄意,不仅切合《水浒传》“发愤著书说”,亦契合《泪史》旨意,而喜爱有加。因此,其关注《水浒传》写作者撰《水浒传》时的隐含立意。至于对《水浒传》作者、作品或传闻或史料等记载,多未注意。这种推崇的最大影响在于其对鄙薄施耐庵或《水浒传》相关评论的主观否认,故说“罗鹤林谓‘施耐庵作《水浒传》,三代皆哑’,岂有如此之天道耶!”抛开施氏三代皆哑之说是否可信,即见此处的判断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评点以契合其读书时的心境为基点;其晚景所热衷的佛教,成为评点具体作品的最终立意。这种感性的品读方式对评论《西游记》等作品有着深远影响。

### 三、《休庵影语》的成书与《西游记》的早期传播

据《休庵影语·纪遗》所言“《影语》初集计五十余幅,在溧阳马绿翼处。”知今传《休庵影语》非盛氏初稿,所撰初稿散于友朋之手。故《纪遗》言“余不肖,赋性疏略,每遇佳纸妙笔,辄临池作数十言或数百言。比成即弃去,不复存稿。曾记从曲中烂醉,书案头斗方满百幅,及醒已为座中诸子携去,只字不可记忆矣。至若书石投诸水,书叶付之风者,又在所不论也。”可见今传《休庵影语》为盛氏追忆旧闻或回忆旧作而成,例证如《总批水浒传》言“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圣于文者乎?其神于文者乎?读之令人喜,令人怒,令人涕泗淋漓,复令人悲歌慷慨。或如亲当其厄,而危切身,又如己与其谋,而功成事定。他如报仇雪耻之举,孝亲信友之情,以及市谗街谈,方书兵法,鬼神变化,龙虎飞腾,种种无不绝妙。”与上文论述盛氏晚景著书时的“孤愤语”、“千秋泪史”等情感倾向相一致。又如《西游记误》言,“余幼时读《西游记》”、“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云,更说明此条是盛氏追忆旧闻而撰,后为周亮工所整理。(见《盛此公传》)与《休庵影语》初集相比,今传之本不仅数量有别,内容亦多不同。需注意的是,今传之本并非按时间先后排列,上引《与周元亮》、《柬甘太紫师》等信札可证。既然今传之本是经多次修录而成的,那么对于其中有关《西游记》等孤例记载的可靠性,是需要进一步辨正的。《西游记误》云:

余幼时读《西游记》,至“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心识其为后人之伪笔,遂抹杀之。后十余年,会周如山云“此样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时订书,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盖《西游》作者,极有深意:每立一题,必有所指,即中间科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决不作寻常影响。其末回云“九九数完归大道,三三行满见真如”。九,阳也。九九,阳之极也。阳,孩于一,茁于三,盛于五,老于七,终于九。则三三,九数也。不用一而用九,犹“初九,潜龙勿用”之意云。三三九九,正合九十九回。而此回为后人之伪笔,决定无疑。

学界援引此则讨论《西游记》流传版本时,往往认为盛氏提及了三种版本,即“盛于斯所读本”、“周邸九十九回抄本”及“周邸百回刊本”,并与其他版本进行比探,以考察《西游记》的版本系统。代表者有吴圣昔《〈西游记〉周邸抄本探秘》<sup>②</sup>、《论〈西游记〉鲁本和周本信息的异同性》<sup>③</sup>、程毅中、程有庆《〈西游

① 王鏊《姑苏志·郑所南先生卓行传》,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② 吴圣昔《〈西游记〉周邸抄本探秘》,《宁波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

③ 吴圣昔《论〈西游记〉鲁本和周本信息的异同性》,《上海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记》版本探索》<sup>①</sup>、曹炳建《〈西游记〉世德堂本研究二题》<sup>②</sup>、《〈西游记〉佚本探考》<sup>③</sup>、刘雨过《论〈西游记〉的微观空间》<sup>④</sup>等等。不过,学界并未涉及盛氏之说的消息来源、撰写时间乃至此则的表达方式及目的意图,而这恰恰是解读此则文献的前提。

首先,上文已述及此则是盛氏晚景追忆旧闻而成。“后十余年”云云,表明撰写时间为其失明之后,是对幼年读书的回忆。由于早期著述多散佚,其自身已无法核证彼时读书时的细节。此时的盛氏已榻卧多年,亦无法求证彼时社会上流传的《西游记》版刻的情形。故所言“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是否就是其早年所读版本的原回目标题,是否存在偏差,这些已无法坐实。案,盛氏早年所读含“清风岭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谈诗”之本到底是在第几回,亦无法证实。今传世德堂本第六十四回为“荆棘岭悟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谈诗”,与盛氏所读之本有别。至于“清风岭”既不见于流传的“西游”故事,也不见于世德堂本,“木棉庵”与今本“木仙庵”亦不同。而学界将其与现存《西游记》版本(如世德堂本、杨闽斋本)相关回目的比较,完全说明不了盛氏所读之本与这些版本是否存在本质之别或同属一脉。现存诸多明刻本皆未与盛氏所言相吻合,亦可佐证。这是个无法求证的伪命题。据以“遂抹杀之”所言,则盛氏早年质疑的是或为此回的真伪问题。

其次,有关盛氏所言《西游记》九十九回本与百回本的存在情形。据盛氏所言,其幼时所读当是百回本,周如山所言“以其数不满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可证。而其所言九十九回本则源于周元亮之父周如山。周元亮为盛氏一生最珍贵的挚友,上引二氏的信札往来已说明这点,周元亮之言素为盛氏钦服。但周如山与盛氏之交到什么程度,尚未见明确记载,惟《盛此公传》提到周元亮与盛氏之交是奉周父之意,周如山对盛氏著述比较推崇,据此推测盛氏对周氏父子之言当颇为信服。同时,盛氏晚景获得的绝大部分信息来源及其读书渠道,多为友朋附信,故亦无法求证所得信息来源可靠或正确与否。玩味此文,盛氏对《西游记》质疑百回本的直接诱导源于周如山。除此之外,主要是盛氏晚景追信佛教,以极为虔诚的心态加以对待,对“假佛行他”的伪信道者极为鄙视。从此文所言“皆关合性命真宗”、“三三九九,正合九十九回”表明其是以虔诚的崇佛心态待之,而百回则有悖于此。“盖《西游》作者,极有深意”云云,说明盛氏判断时缺乏事实依据或文献记载。据此看来,质疑百回本的存在,或者说以九十九回为原著所有,实在是盛氏的主观臆测。又据上文,盛氏著书判断多凭自己的主观意见以定,带有明显的个人性情偏好。其对《水浒传》的判断如此,即便是《西游记误》亦不出此藩篱。此则接着又说“至若《关尹》《管子》《博物志》,皆后人伪笔,读者皆不可不辨。近日《续藏书》,貌李吾卓,更是可笑。若卓老止于如此,亦不成其为卓吾也。”<sup>⑤</sup>案,李贽好友焦竑在《续藏书序》曾说“李宏甫《藏书》一编,余序而传之久矣,而于国朝事未备,因取余家藏《名公事迹》绪正之,未就而之通州。久之宏甫歿,遗书四出,学者争传诵之。其实真贋相错,非尽出其手也。”<sup>⑥</sup>据此,虽然《续藏书》是否完全皆出自李贽之手尚须辨正,但李氏确实写过《续藏书》。盛氏完全予以否认,实是其对李贽的推崇及《藏书》“发愤语”与“予李吾卓一人之是非”契合其心境而得到认可,而《续藏书》并未明确表现出这些,加上彼时假李贽之手之多,盛氏不察。据盛氏所言“余最恨今世齷齪竖儒,不揣己陋,欲附作者之林,将自家土苴粪壤,辄托一二名公以行世。”从行间言语看,盛氏的辨伪依据完全是个人性情先行,故其鄙薄《续藏书》为假就不足为怪。据此类推,在信息来源有限的情况下,其则所言《西游记》九九之数(九十九回本)方为原作之本是据以实物依据抑或是主观推测,亦无法求证。

今存《西游记》诸多版本系统,包括“华阳洞天主校本”三种(即《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新

① 程毅中、程有庆《〈西游记〉版本探索》,《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② 曹炳建《〈西游记〉世德堂本研究二题》,《东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③ 曹炳建《〈西游记〉佚本探考》,《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

④ 刘雨过《论〈西游记〉的微观空间》,《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

⑤ 盛于斯《休庵影语》第37页。

⑥ 李贽《续藏书》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

《全像西游记》、《唐僧西游记》) 除题署略有别外,皆作20卷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不分卷,亦为百回本;以上皆为明刊本。另有清初刊本《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等,亦作百回。又,明刊本《鼎镌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题“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计10卷,不标回数。上述版本无一作九十九回。除盛氏之言,未见现今已发现的明代资料中有记载《西游记》九十九回本一说。从版本实物及文献记载两方面,可佐证《西游记》九十九回本之说是值得怀疑的。或许有人会说,今不存或不见记载,并不能否认章回小说《西游记》于明代就有九十九回本存在,文献或实物或已湮没无存。我们认为,作为科学的研究,任何假设都需要事实来论证的。科学研究就是求证,如果不能用事实来证明这一假设,这一假设就不能成立。把未经论证的假设作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讨论,这样的研究应该是不科学的。因为假设本身就有两种可能,假设者并不能排除根本就没有这种记载的可能<sup>①</sup>。学者们所谓有关文献可能暂未发现、可能已散佚却并不代表这些文献没有存在过,此类意见仅是提供一种不可被证明真假的“可能”,而事实的存在情形却只有一种状态——是与否。“可能”不是“事实”,何况还有相反的“可能”;除非学者们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或可被证伪的判断,否则在“可能”性上绕圈子,无助于问题的解决<sup>②</sup>。而根据事实得出的结论,即使错误也是科学的,因为它是被证实的,也是可以被证伪的,如果谁发现了新的事实,谁就可以用此事实来推翻原有的结论,从而推动这一认识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休庵影语·西游记误》所谓《西游记》九十九回本之说并不可靠,可暂存疑待考。

再次,此则的主要价值点集中于周如山所言。具体而言:一是章回小说《西游记》在刊刻前是否存在钞本流传阶段?一是钞本是否九十九回本而刻本为百回本?一是“周邸本”是否与其他资料如周弘祖《古今书刻》所录山东“鲁府”本等属一脉?这些问题对弄清章回小说《西游记》的早期刊刻传播情形是有启迪意义的。但限于文献所囿,我们同样找不到周如山今存著述与之有关或相似的记载,亦不见时人提及《西游记》九十九回钞本的记载。因此,从文献传播学的角度看,除非能找到相关实物或文献记载、乃至旁证,否则这条资料不能作为探讨《西游记》版本系统及流传的重要证据,甚至将此与其他记载进行比较都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同样弄不清周如山之言是否存在偏差,这个前提不能被证实。故而,以此为据的后续研究将只能是推论,以此讨论《西游记》佚本存疑情形,其价值是可存疑的。

应该说,《西游记误》这则资料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其他视角,有助于启迪学界有针对性地去挖掘相关文献资料,推动研究的深入;但对这则文献的价值及其信息解读,不应过多臆测。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① [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83页。案:需要说明的是,使用拉卡托斯的观点时,应注意历代公私目录所载诸多亡佚之书等特殊现象。历代公私书目所载的诸多亡佚之书或虽今已不存,然这些书籍大多是编纂者对历代官藏、私藏书目的记录,所录之书在历史上大多曾经存在过。公私书目对其的记载,就表明这些书籍的存在有着实际的可靠的文献证据。

② 温庆新《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的方法论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